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黄季陆 著

黄季陆先生 怀论文集

下册

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黄季陆 著

黄季陆先生怀论文集 (下)

中華書局

访问韩国的回忆

一 严寒中的人情味

一九六四年春，韩国教育部部长尹天柱先生邀我前去韩国访问，因那时事务羁身未能前往。到了是年年底，适“行政院院长”严静波先生有访韩之行，于是乃相约同去。在我访问韩国之前，汉城庆熙大学校长赵永植先生，本已向我约定，拟在我访问的时候在该校作一次讲演并接受该校荣誉博士学位的赠予。但由于各项官式访问节目早已排定，不能单独抽身，好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这一天，韩国政府为严先生所排的节目是参观南北韩分界的在三十八度线的板门店，于是我只得放弃前往，改赴庆熙大学之约。因此，访韩最有意义的一项节目参观板门店，我竟未获前去，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凡是到过“自由中国”的友邦人士，无不称赞中国人好客而具有人情味的习惯。大约由于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上有了

悠久而密切的关系的缘故，使我在访韩期内对于主人的殷勤周到，推诚相见的热烈，不禁有宾至如归之感。虽然此时汉城的天气正值严冬，气温已在零下若干度，使人并不感觉寒冷！

当我到达汉城之后的一天晚上，庆熙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尹永春先生特来见访，他问我有没有准备演讲稿？我说已匆匆准备了一份，题目是：《中韩关系与亚洲安危》。

他读了我的演讲稿之后，坚持要把讲稿译成韩文，说是一篇可作研究中、韩关系的重要的文献。并且说，他是庆熙大学特别指定作我的韩文翻译的，盛情难却，故亦只好听之。

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这天的上午，我到了庆熙大学，看见礼堂挤得满满的，他们安排好的三百多由学生组成预备在会场演奏的乐队，都无法进入会场，有大半停留在会场之外不能进入。学校并早准备好了一个欢迎我的乐曲，由几百只凡峨林乐器合奏起来，悠扬悦耳，使我了解韩国青年对于音乐的造诣水准之高，与学校对于音乐教育的普遍重视。当我继赵校长永植之后致答辞时，我只短短的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向全校在场的师生和来宾说：“我准备了一篇讲辞，已由中文系尹主任代我译成贵国的文字，我相信尹先生的译文一定比我原文好，除了请尹先生把我这几句话用韩语翻译之外，便请尹先生代为朗诵，我就不必麻烦他逐句逐段在我讲了之后再翻译，增多一次麻烦，占据了各位太多的时间。”我这一安排似乎非常的成功，既节省时间，又免去重译的麻烦，而且内容与

语气都较连贯而有力了。我听到尹先生用韩国语宣读我的讲辞时的神情韵味，不断的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我便知他的译文一定比我原稿还要好，的确是一项很成功的安排。我在此应当对尹先生表示我无限的谢意。

不久以前，韩国国际问题专家，亚细亚学术研究所所长李瑄根博士，托人征求我的意见，拟把我去年一月三日在庆熙大学所讲《中韩关系与亚洲安危》那篇讲辞，载入为纪念他本年六十华诞而出版的论丛一书里面。最近李先生把已出版的一大厚册论文集寄赠给我，其中包涵很多极有价值研究亚洲问题的论文，他并把我那篇讲辞抽印了几十份寄给我，盛意非常值得感激。我把书中所载的我那篇讲辞重读了一次，我觉得尚有许多现有的资料，当时因匆匆执笔，未予论及，我想就我去岁访问韩国的回忆加以补充，以表达未尽之意。

二 中韩关系与亚洲安危

远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当日本出兵山东，阻挠中国北伐军事进展的时候，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次韩国青年的聚会，在会中，感于中、韩两国同被日本侵略，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慨，我曾向韩国青年说：“有一天，中、韩两国挣脱了日本的压迫，我必将到自由独立的韩国一游。”这一愿望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是十分的渺茫，但今天我来到韩国了，这一

愿望果然实现，衷心的愉快是可以想见的。

中、韩两国过去在历史文化上，关系的密切与悠久，两国的人士知道得很普遍，两国的史家对此曾有不少的专著，不用我多所阐发。

我现在要说的不完全是过去，而是现在和将来。是想从地理的环境来说明中、韩两方的休戚盛衰的相互关系，因而寻求出我们两方今后的共同目标，来共同努力。

近代中国的处境，在地理上，遭逢着两大邻近国家的威胁，一是广大土地接壤的俄国，一是海上的日本，这两个国家的野心和扩张不戢止，中国固然是要受到威胁，韩国亦是同样的不能幸免，或者还要首先被牺牲。这是我中、韩两国最共同的地方，也是我们两国利害相共、休戚相关最不可分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的时期，中国遭受了几次失败的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次，一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局面；一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由于中国失败的结果，大陆上来了新起的日本势力，首先遭到不利的第一步是韩国；第二步是日本以韩国为跳板加速其北进政策向中国侵略。日本这一侵略势力，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才获消失。这是中国经过了八年抗战的牺牲所获得的结果，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后陷于疲弱，而好景不常，不久中国大陆“便为苏俄所培养的中国共产党所窃据”，而引进了陆上接壤的北方敌人苏俄势力的日益扩张。在这一情势之下，韩

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统一，却又被分为南韩与北韩。一九五〇年，中国大陆共产党又乘势与苏俄结合起来对韩“发动侵略”。这说明，凡是中国所遭受的不幸，勿论是来自俄国或是日本，中、韩两方的利害休戚总是相共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幸而获胜，在中国，日本取俄国所经营侵略的满洲而代替之；在韩国方面，则因日本之胜利，瞬即为其所吞并，于是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则更越发猖獗而不能抑止了。假定这次的战争胜利属于俄国，韩国的生存必定陷于俄国的掌握，其时的中国亦不能自保。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不难从地理形势上知道韩国所处地位的重要，因为韩国正介于日本、俄国、中国之间，祸福都难置身事外，作一自了汉。中国虽然是广土众民的国家，但在近代却一直居于被侵略压迫的境地，从中国的立场言，我们寄望于一个统一强大的韩国的实现，不单是为了韩国，亦是我们道义和利害上所需要的。因此，在亚洲，足为中国之友的唯有韩国，足为韩国之友的亦唯有中国！

在我去到韩国之前不久，一九六四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中国国民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七十周年的日子。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的那年，是一八九四，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正是日本肆无忌惮地侵略韩国与中国的年代，自此韩国被日本并吞，中国则奋起革命以图存。这一事实并不是巧

合，更非出于偶然，是中韩两国休戚与共的又一历史明证。因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韩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贯的主张，必须如此，中、韩两国才能联结起来共同抗御来自海上、陆上的威胁和侵略。中山先生的这一主张，不仅见之于公开的言论，更见于他逝世若干年以后才被发现的秘密资料中。

中山先生于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后，一九一三年访问日本，其时正值日本政坛强人桂太郎第三次组阁（日本自有内阁制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至三十八年十二月，在此期中，他所干的两件大事是——日英同盟与日俄战争）。

中山先生与桂太郎曾作数次密谈，他指责日本的第一件事便是关于韩国的問題，中山先生说：

“就大亚细亚主义的精神而言，应以真平等友善为原则。日俄战争之前，中国同情于日本，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反而不表同情于日本，其原因在日本乘战胜之势，举朝鲜而有之。朝鲜果何补于日本？然而日本之侵略朝鲜，影响于今后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种措施为明智者所不为！”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其时中国革命的环境非常恶劣，他于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当陈炯明叛军攻击广州之前两日，广州已岌岌可

危，他犹致书日本山本内阁的文部大臣犬养毅先生，犬养毅是中山先生的老友，与中国革命的渊源甚久。在信中，他认为只有韩国、中国、日本的提携合作，才是亚洲安定的枢纽。他指责日本：“于战胜俄国之后，无远大之志、高深之谋，只知步伍欧洲的侵略手段，竟有侵占朝鲜之举，致失亚洲全体之人心，殊为可惜！”

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时，中山先生寄望日本能作亚洲民族的干城，以抵御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日本却乘战胜俄国之势，做了帝国主义的伙伴，第一步侵占了韩国，第二步则进攻中国。这是亚洲祸乱的根源，是中山先生深为惋惜的。

三 一页错误的历史

日本之吞并韩国，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的用意与失策，正如第一次大战之后，在中国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派赴巴黎和平会议的全权代表金奎植先生，在向和会陈述书中第十四款中所说：“日本的大陆政策为日本甚长远之政治计划，而触及英国、法国、美国重要利益者也。——而其并合高丽实为之显示——日本以外之国家的危险（英、美、法均在其内）无不在于日本之无限际的大陆政策之实行一事。此种政策计划，第一在统治管理中国之人力富源，以攫取亚洲霸权——以日本之占有高丽为侵略中国大陆根据地，使之可能——第二则支

配太平洋以为惟一手段，以为日本移民入澳洲、美国无限之门户。”

说到一九一九年向巴黎和会请愿的韩国临时政府全权代表金奎植先生，我在此要特别寄予无限的敬意和怀念，在中国对日抗战的时期，他曾任我所主持的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外文系的主任教授，他的英国文学造诣很深，他与校内的同事们发生了很浓厚的友谊，异常的被川大同事们所尊重。出生在四川的著名诗人白屋吴芳吉先生所著《婉容词》，便是由金奎植先生翻译成英文的。他其时因为任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不能兼任教职，乃离校而到重庆。据闻在韩国光复之后，因他回到了他的祖国，却又因在韩战时期汉城曾一次陷落，被北韩军队所俘获，他以此而惨死在北韩，这次我韩国之行不能与他相见，是我所最引为遗憾的。

一九一九年韩国三一反日独立运动爆发，是被压迫民族独立战斗的先声，自此以后，韩国志士们致力于反帝抗暴光复故土的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由于韩国临时政府设立于上海，便与中国革命党人有更多接触，更有不少的韩国革命志士，不分彼此，不惜牺牲参加中国革命，他们的伟大贡献，至今长留在我们心中而不能忘怀。

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派国务总理兼外务部长申圭植先生为专使，到广州呈递国书，当时我国革命政府局处广州一隅，而韩国临

时政府却流亡上海，同处于一个艰苦的时代，国际间我们尚无派遣专使相互承认的外交形式，有之，则自中、韩两国革命政府始。

中、韩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密切已如上述，现在我要说的是中山先生为何要指责日本侵略韩国的失策呢？

第一，日本侵略韩国，是日本踏足到大陆，是日本大陆政策，以韩国为侵略中国的跳板的开端。

第二，有一独立统一的韩国，可以屏障日本向中国的发展，亦可以中、日、韩的相互提携来应付雄跨欧亚两洲大陆的俄国势力向东方的扩张，过去是如此，现在亦是如此。

中山先生的远见，时至今日都不幸而言中了，中、日、韩三国的提携是中山先生为中国谋、为日本谋、为亚洲民族谋的基本政策。在一九四三年美国罗斯福总统、英首相邱吉尔和我国当时的蒋介石主席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在开罗会议的共同宣言中，蒋主席特别主张战后一个独立的大韩民国建立之必要，这一努力正是遵循我国国父生前的主张之实现。

日本最大的错误，是在日俄战后舍亚洲民族的干城而不为，竟以效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得计。因之，在第二次大战初期，虽然得到一时的胜利，但最后却遭受了极其惨痛的失败。世事如棋局，一着之错，满盘皆输，日本军阀是要负其责任的。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今后亚洲的安、危、祸、福，全

在这七十年来之往事，是否能唤起吾人之深省。

四 从民间故事看文化渊源

我去年访问韩国时最使我难忘的是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这种亲切之感何由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来之有自。我试举出几件平淡无奇的事来说，譬如：勿论是老一辈的韩国朋友，或现在正当权的政府诸公，都无不与中国有深切的关系，在官式的谈话中我们例须经过一次由人翻译成对方的国语，以示尊重，实则韩国政要中对中国文学有造诣，说中国话很流利的人，为数不在少数。我们访问的一群人中，如果不明白此点，说话一不小心便会闹出笑话！至于曾经到过我国，参加过韩国未光复前韩国临时政府在我国居住很久的人物，那更不用说了，有的满口的北平话、四川话、云南、贵州的话，或上海话，令人几乎分别不出来他们原是韩国人。现任韩国“驻华大使”金信先生的父亲金九先生，他是韩国的一位开国的英雄，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时代的主席，也在光复后回到韩国，不幸被他的政敌刺杀。说到他的中国文学与语言的造诣，固不待说，即以金信先生本人和他的夫人来讲，金信先生讲的我们的国语，与他的夫人所说的流利的上海话，都不是普通的中国人所能及得上的。曾经在“自由中国”担任过韩国“大使”的金弘一先生，他在中国军队服务很久，我们的北伐、抗战几乎

无役不从。当抗战胜利，我们接收东北的时候，他被派担任遣送韩侨的任务。那时他用的是一个王姓的假名，每每讨论到有关韩侨遣送问题的时候，他当然要比任何人要表示更为关切维护，其时不知道他身份的人往往指责他不是在为自己国家中国服务，而是韩国派来的代表，一切都在韩国的利益着想。到了后来，他果然被韩国政府任命前来担任驻“自由中国”的韩国“大使”，大家才对从前指责他是韩国派来中国服务的话加以证实了！我们在访问丁一权总理时，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一个写得极好的中国黄山谷字体的屏风，我疑心这是中国的珍藏，流传到韩国去的，后来详细一看，原来出于一位韩国书家的手笔，使我非常的惊异！

一位韩国的朋友要求我讲中国的笑话，我把中国民间相传一个懒人的故事告诉他。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位懒人，吃饭、睡觉、穿衣都全靠他的太太照顾。一日他的太太要回娘家为他的父亲祝寿；不去，礼所不许；若去，则又恐其夫三餐无人照料。于是行前制一大饼以绳系于其夫颈上并告以饿的时候，使用口自食。不料他的太太祝寿归来后，见到他的丈夫业已饿毙，而其颈间所系之大饼则仅食去嘴边的少许！其懒的程度到了宁死而不顾的地步！

我把这一故事说完之后，这位韩国朋友，并不感觉稀奇，他坚持这一懒人故事是韩国的，而不是中国的。我问他有何证明？他说这一故事在韩国民间都很流行，而且书籍中都有记

载。由这一故事可看出中、韩两国民情风俗的相同，历史文化的悠远了。

我在庆熙大学讲话之后，另有一位韩国的学人对我说：“你今天的讲话非常成功。是谈中、韩关系历史的新页！”我问他是甚么理由？他说：“你讲得非常坦率，是从现代的两个休戚相关的事例引证，是从地理的、政府的和利害的说明两国的密切关系，不是只说明远古的历史渊源，而是说明现在和未来两国关系必须密切合作，才能相互有利。从当时那些青年听众的表情上便很可看得出来。”我说：“难道讲中、韩两国的关系，不在古远的历史中找根源，舍箕子这类的历史不谈，而能寻求出中、韩两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关系吗？”他说：

“讲远古的关系，在老一辈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无需多讲。因为谈过去固然重要，说现在和将来则似乎更为实际吧。目前正是中、韩两国必须急切掌握的一项现实，面对这一现实努力，我们两国才能使过去在历史文化密切的关系，发出更大的光辉！”我记得罗素曾经这样说过：你到有教养的中国人的家庭访问，你可以见到主人室内的陈设和主人高兴时拿出他中国古代的珍藏，如周鼎、汉简之类几千年以上的东西，娱乐客人，使客人发生无限怀古的幽情。如果你到了一个美国人的家里，你所见的将是主人最欣赏得意的一些日新月异出现的事物。如果是一个古代文化的鉴赏家，这样你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如果就现实而言，你将感觉到近代世界

之进步是如何的快速惊人，而我们今日则是如何的未能发挥前人的光辉，而退居于落后国家之列！对世界文化如再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我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必定无可逃避！韩国是一新兴的国家，朝野人士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十分令人感奋，若干地方很值得我们的效法。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正随他们国家的进步而日益在增强之中。在我看来，谈论今日中、韩两国的关系，与其漫谈已往的过去，倒不如面对当前的现实，合作无间，以对付共同敌人之较为得策。

五 今后的企望

韩国自李承晚先生去职之后，虽经过了短暂的政治不安定，但新的政府在朴正熙大总统领导之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均已有显著的进步。在目前安定的政治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前途必定是十分光明的。我最欣赏他们朝野人士作事那种爽利明快，有计划，有目标的干劲和冲击的精神，虽然有时错误浪费在所不免，但毕竟日日在往前迈进之中，经验多一点，自然会老练起来，新政府在外交方面有一项重大的成就，那便是对日恢复邦交的成功。这一工作的成功得来非易，是从坚持政策，克服万难中挣扎得来的成果，没有一个负责任而有魄力的政府，是不会做得出来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韩两国在地理的环境上有两个共同的、和不易避免的威

胁，一是来自海上的日本，一是来自陆上的俄国。目前来自日本政治的和军事的威胁似可暂时停止，却是自中国大陆“沦陷”给中国共党之后，其所加于新韩国的威胁并不比昔时的日本为轻，竟已有取日本而代之之势。来自北方俄国所加于韩国的威胁，却仍十分严重，亦并未因时代的推移而为之减少。因此，在目前亚洲反共产阵营的一面，足以为“自由中国”之友的依然唯有韩国，足以为韩国之友的亦依然只有中方。中、韩两方的关系确已至艰危与共，成败相依的地步，而成为今日最不可少的盟友了。

自中山先生的遗教到二次大战中开罗会议的宣言，孙先生与蒋先生，都衷诚的寄希望于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统一坚强的大韩民国的诞生，不仅过去是如此，现在更应如此。不仅为韩国谋、为亚洲谋要如此，为中国谋亦更要如此。回忆当民国八、九年之交，其时中山先生尚健在，朱执信先生曾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机关刊物《建设杂志》发表一篇长达数万字、论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请愿的文章。此文对韩国的独立革命有如下的希望和结论：

……朝鲜人之精神革命，今正在其进程之中。日本之经济上侵略已使全朝鲜人民化为不识政权之无产阶级者，正所以隐括朝鲜人民，使具有革命之精神耳。夫革命精神之故乡，在面包缺乏之所。冬暖号寒，年丰啼饿，即朝鲜人革命授课

之钟声也。朝鲜独立之内在的条件，既以日财阀之力成就之矣，其外的条件将于何时？以何如人力之成就之欤？非吾所敢知也。其必有此朝鲜复活之一日，则易知也。日本其奈此同文同种之朝鲜何哉？

此为四十七年前，中国革命先进朱执信先生，所企望于韩国革命之成功，既殷且切的一种同情与热望，当时的人不少以为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到了今日此一幻觉已成为事实，新的大韩民国已经诞生。我们今日企望于今后一个自由强大的韩国的进步发展，俾成为“亚洲自由的支柱，反共的有力盟友”，与四十七年前朱执信先生所企望于韩国革命的成功者正复相同，谁又能说我们这一企望仍是一种幻觉！

（原载一九六六年七月《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一期）